

# 陈染小说里母女关系的瓦解

## — 《无处告别》与《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盧昇淑\*

### <目 次>

- I. 序 言
- II. 空白之页上重写的母亲
  - 1. 爱与恨的交叉
  - 2. 永恒的负疚情节
- III. 结 语

## I. 序 言

五四时期热烈的关于“人”和“女性”的思考，到了新中国，无性别(或者中性)意识形态以及无视性别特点的女性政策，对女性话题导致了女性性的淡化和政治性的强化。就这样，在共和国本身带有的女性理论不足以及封建父权思想残留的背景下，母性既作为再生产的家务劳动者，同时又作为共和国公民的社会劳动者，更加深了母性角色的双重性：“男女只能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走到一起。在道德守则上，传统的妇德却仍在发挥着效用，女性仍要兼具传统的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的特点，在外面参加生产劳动是一把好手，回到家来，又能宽容柔顺伺候男人。在外面是‘铁姑娘，在家里面是好媳妇’<sup>1)</sup>。这一母性问题经过文革十年的历史动荡，不但加快了母性

\* 신구대학교 비즈니스중국어과 교수

1) 楊匡漢、孟繁華 主編《共和國文學5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p.318.

双重角色压力，而且漠视性别特点的主流意识形态促进产生了男性化的母性。

新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在法律上的男女平权基础上开展，与西方的女性运动史相比，作为与男性对比的女性性别意识难免单薄。粉碎四人帮以后，新中国的大门积极对外开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改革的变化发生在封闭了将近三十年的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在女性问题上也不例外，李小江对八十年代的把握非常尖锐，值得参考：“80年代，当代中国妇女研究刚刚起步时，正当西方妇女研究转向性别研究，中国妇女学者却视而不见地依然执着于‘妇女’，惟恐性别研究在趋向中性科学的同时重新遮盖了妇女研究着意张扬的女性人的立场——正是这个‘妇女’研究，在抹去女权的政治色彩时突出了它特有的政治性，与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非性化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对比”<sup>2)</sup>。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母性书写在这些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本论文以陈染的小说为中心，主要探讨这些反思过程当中传统母女关系的瓦解。

## II. 空白之页上重写的母亲

一九四九年以来，将近三十年的新中国文学中女性文学几近“空白”。虽然从当代的视角重读十七年中一些女性文学文本的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但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女作家与女性文学进行的政治外压、女性文学从而“脱离正位”的现实不可磨灭。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进入新时期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直接继承了五四的女性精神，在“伤痕”与“反思”的文学主流中作出划时期的工作。女性文学的重新崛起，从对“女性意义”的反思开始，文本带有浓厚的伤痕意识。李惠薪的《老处女》，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稍后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铁凝的《麦秸垛》、《棉花朵》等等作品。这些作品从女性深层内心的欲望入手，审查作为“女性”的独特的性别意识，后两位的文本相当意义上摆脱了前几位对爱情的抽

2) 李小江《婦女研究的緣起、發展及現狀—兼談婦女學科建設問題》，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98，第4期，p.131.

象理念思维，直接涉及到女性的生理性欲，显得更激进、更赤裸。

如果这些作品是对女性性的审视，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以及张洁的《方舟》等是对母性性的审视。前两篇在“当代母亲实体的探索”的意义上具有当代性的含义，后一篇在“对母亲反面形象的写作”的意义上具有突破性的力量。《方舟》一篇是继承现代文学时期的反叛母亲形象写作，同时引发八十年代中后期“母性写作”的作品。比如，残雪的《苍老的浮云》，铁凝的《玫瑰门》，池莉的《你是一条河》，方方的《落日》、《风景》，万方的《在劫难逃》，常青的《空壳》等等作品。除了铁凝的《玫瑰门》，池莉的《你是一条河》以外，还有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徐小斌的《羽蛇》等作品，都是以几代女性的生活历程为中心展开叙述的梳理“母亲谱系”的作品。这些以母亲为中心的写作，以不弱的势头冲击着当代仍然隐藏着的父权制的母性主义，同时监视着父权制专制在文化领域中的干扰。

特别在八、九十年代的母性写作中，另外令人瞩目的写作方法是，一批女作家的“母女关系”写作，诸如，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陈染的《无处告别》、《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等等。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的主体脉络似乎是现代第一代女作家群的“母女联带”的写作，但是陈染的作品区别于现代女作家对母性的讴歌，是一种“母女对立”的写作。陈染的母女对立写作，从女儿的角度反映了当代社会特殊的母亲思考，这种与女性对立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反叛母性的写作，更以别致的风貌提示着中国当代母性和女性的思考。

## 1. 爱与恨的交叉

拥有一个有知识有头脑又特别爱你的母亲，最大的问题就是她有一套思想方法，她总是要向你证明她是正确的，并且总在告诉你应该如何处事做人，如何决定一件事。你无法；像对待一个家庭妇女母亲那样糊弄她，敷衍她；但你又绝对无法听从她。<sup>3)</sup>

3) 陈染《残痕》，《无处告别》，经济日报、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p.116.

张爱玲的《金锁记》，凌叔华的《太太》，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的母女关系（曹七巧和长安、太太和女儿、大娘婆婆和团圆媳妇）是一种支配的母性和从属的女儿之间心理发泄和接受的关系，陈染的《无处告别》、《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母女关系（黛二和母亲）是一种紧张关系，是直接受新中国女性解放思想影响的母亲和在西方女性思想的熏陶下渡过少女时代的女儿之间的紧张关系。两个时代的写作都表现“反常的母女关系”，但是，前者是在单向的权力执行过程当中造成的，后者是权力的母亲和已经拥有女性意识的女儿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当代社会认可孩子也拥有独立的人格，而且对女儿的价值评价也基于男女平权的法律规定，女儿已经不同于过去的为了当成母亲而成长的，她作为一位独立的女人得到文化的认可。母亲和女儿双方的自我中心都不会减弱，尤其是与母亲同性的女儿在与母亲的关系中，会产生比男孩子更直接、强烈的心理反响。

女性学者Chodorow的“对象—关系理论”比较重视女儿和母亲的同性纽带。在“前恋母情结”阶段，女儿在自己与母亲的同一化过程中形成正面的“性整体性”，视同性的母亲为自己的同一体，自然而然内化母亲的内质和性角色，从此形成母女纽带的基础。到了“恋母情结”阶段，女儿发现男性的文化主导权力赋予“性差”以“变形的性别价值”，女儿在以后的成长阶段中会遭到性整体性的困惑。《无处告别》中的“黛二”是父亲和母亲的宝贝独生女，从小受到两亲的关爱，特别是黛二的父亲对她的珍惜已经超过了她向爱人的关心：“黛二家里从来民主气氛好，没大没小，没上下尊卑之分。

（……）他第一爱我党，第二爱黛二。（……）成长在这一个家里，黛二从骨子里散发着潇洒和傲气”<sup>4</sup>。按照Chodorow的“对象—关系理论”，女主人公黛二在“前恋母情结”阶段已经形成了与母亲的纽带，按照家庭的文化气氛，她从父亲那里接受到比较好的性别价值意识。文本以黛二的父亲去世后为主要时间背景展开叙述，以黛二和母亲两个人的家庭作为文本的空间背景，即，主导家庭气氛的父亲去世后，家中只留下了黛二和母亲两个单身女人，这家变成一个“单性家庭”，两个女人的故事在父性缺席的文本背景中开始。

Chodorow的“对象—关系理论”能够说明女儿在“前恋母情结”阶段，不同于男孩子

4) 同注 3, p.84.

的一些特殊情况，但是对“恋母情结”以后的成长过程却没有更深的把握。尤其是，对出现第二性征的青春女儿如何接受“生理的性 (sex)”和“社会的性 (gender)”的问题，她所说的母女纽带的正面效果不足以调整两者之间的矛盾。父权制的社会机制从一个女孩子与父母接触便开始，父母在家庭中社会性角色分担明确，这呈现着男女性别的社会认可标准。如果一个女孩子能够拥有一个超越性别分担意识的父母，于是能够在割除性别角色意识的环境里度过童年时代，但是一旦她的社会化过程开始，就迅速瓦解已有的平权性别意识，而在父权制的“社会化”过程中被重构性别意识，逐渐内化父权制所指望的性别角色。就像已经完成身体发育的黛二面临的对性爱的挫折，和重新找工作时遭到的社会权力分配问题等等，对顺利完成幼年成长过程的她来说，这一切就足以打击她的性别意识和个人意识。在她的成长过程中，身边围绕着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间接或直接影响到她对各方面意识的确立或调整。

黛二的朋友麦三是一个高大丰满、性欲旺盛的女人，与她相比，黛二的瘦削柔弱的身体不显得性感，而且自己对“快乐的体力劳动”也缺乏热情，精神和肉体双方都经常感到一种孤独，这些孤独使她产生了一种对性爱的劣等感。她和约翰·琼斯在美国度过的一段生活却给她留下一个性器具交合的印象，“而她内心的东西却从来不曾被唤醒（……）缺憾空虚之感（……）最后，总结为爱情的缺乏”<sup>5)</sup>。曾经追过她的男人墨非和她的暧昧关系等等这些无不给她留下一种沉重的空虚感。另外一个朋友缪一是为了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安全感才选择“谁谁家的儿子”。正因为此，黛二开始时对缪一极为反感，但是到后来黛二找工作的时候不得不托缪一帮忙。在物质和肉体的强大力量之前，黛二只能认识到精神和心灵的脆弱，通过这些领悟重新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中多么无力、渺小。因此在文本中，黛二和母亲的第一次战争从黛二的回国开始，这一时间是黛二已经经历过种种个人纠葛以后。

黛二小姐与母亲这两个单身女人的生活最为艰难的问题是他们都拥有异常敏感的神经和情感，稍不小心就会碰伤对方，撞得一塌糊涂。她们的日子几乎是在爱与恨的交叉中度过。黛二母亲在失去伴侣后，全部的注意力和情感都倾投到黛二身上，这就要求黛二得付出与之相当的注意力和情感才能使母亲得到平

5) 同注 3, pp.104-105.

衡。可是这对黛二来讲太难了，她有自己更感兴趣的世界，有自己的朋友，伴侣和未来。于是，注意力的不公平使得她们的生活异常紧张，常常闹翻。<sup>6)</sup>

黛二的母亲与黛二同样拥有异常敏感的神经和情感。母亲对黛二的关心由于丈夫的去世突然大大膨胀，但是黛二对母亲的关心并没有由于“父性的缺席”一下子增生，反而随着黛二的成长更加倾注到母亲以外的世界。母亲的世界越来越向往所谓她自己的工作而黛二而向内部世界缩小，黛二的世界越来越向往外部世界而扩大。就这样，母亲心中对母女纽带的期待逐渐浓重，而女儿心中对母女纽带的期待逐渐淡化。而且她们之间存在的代沟，使她们的关系格外紧张。两个女人站在一条绳子的两端，她们各自抓好绳子的一头。敏感的神经系统碰撞时，两个女人之间的绳子紧张得画出一种平直的直线，稍微缓和的时候就画出倾斜的曲线。这时母亲会一点一点切短绳子，从而走近中心，女儿会拿来另外几条绳子（一条是朋友，一条是伴侣，一条是未来……）连接到原来的绳子上，绳子变得更长，更远离中心。对母亲来讲，父性的缺席就意味着“安全感”的丧失，为了弥补父性的缺席，一定需要另一种支撑，于是母亲自然靠近女儿，在女儿那边寻求依托和交流。尚未从异性的那边尝试过任何安全感的女儿，在父性缺席时比母亲活得更“潇洒”。单身的女儿总是追求“独立的自我”。万一她的自由受到什么约束的话，起码她是受未来的丈夫的约束，不会让母亲来约束她。母亲想要独占女儿，但女儿不愿意这样，她们的心理纠葛就从这一点开始。

另外，黛二的母亲是一位知识女性，黛二不能够“像对待一个家庭妇女母亲那样糊弄她、敷衍她”，但同时“又绝对无法听从她”。在八十年代，中年母亲们在痛苦的挣扎中度过了价值混乱、整体迷茫的阶段。她们行进中的每一步都是又孤独又沉重，留下一滴一滴的热血与汗水诉说着她们无比艰难的历程。她们为了家庭，为了自己，马不停蹄地奔波。她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也会暂时停下手头的事情，对结婚、孩子、丈夫、家务、工作、家庭、社会、女性、母性重新反思：“我”到底有没有结婚的权利？“我”一结婚就自动要孩子吗？对“我”来讲丈夫是什么样的存在？家务和工作是否并存？家庭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如何接受女性？这女性与母性能否互补？等等，生活在共和国的母亲面对种种的话题深思又深思，尽管有所局限……。但她们毕竟走过了八

6) 同注 3, pp.110-111.

十年代，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系统、具体的价值体系把她们送上了九十年代。她们成为九十年代的知识母亲，她们不像过去的母亲那样是纯粹的家庭妇女，而是在家庭和社会两个领域都担任着角色的共和国公民。但她们也不像九十年代的女儿，她们思想的局限来自她们的身份，作为具母的身份反思这一切的时候自然会受到一定制约。她们是“先经验后反思”的一代人，不像九十年代的女儿那样“先考虑后行动”。她们处于半觉悟的状态，难免与女儿们冲突。陈染在《无处告别》一文中刻画了面临着瓦解危机的一对母女。母亲和女儿反复冲突，每次遭到瓦解的危机，也会找到和谐的共同点，因为她们是爱对方的，因此她们在“爱与恨的交叉中”继续艰难行进。

## 2. 永恒的负疚情结

《无处告别》以后，过了三年时间的一九九四年，陈染又发表了一部小说《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这是一篇以母女关系为第一主题的作品，可以发现陈染在《无处告别》以后对母女关系的思考更加细致、深刻和激进。

我必须紧闭门扇，轻手轻脚地将窗帘的缝角拉严。  
我的母亲就在隔壁的房间，目光盯住我火一般灼燃忧虑。我四周的墙壁永远惊  
醒着站立，被她的某种担心和提防，焦虑得无法睡去。墙壁是眼睛，凝视我的  
目光是爱情般穿刺心脏的利剑，它阻挡我迈向外面的世界。我自身心灵的厚茧  
与她帝王般森严的爱，是阻隔我向外界诱惑探出身去的城堡，这城堡被我和母  
亲日积月累的相依为命，一笔一笔涂染成晃眼的黄色，像运动场上裁判员的黄  
牌警告，贴近城堡走近我的犯规者，必定要罚出“场外”。我在城堡里是一只珍  
贵的名牌狗，我浑身涂满同样沉默的麦黄色—拒绝的颜色。<sup>7)</sup>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的家庭背景也是两个单身女人组成的单性家庭，母女俩是都有离群孑孓的相依为命的女人。女主人公黛二和母亲的紧张关系，在母亲对她强烈的“所有欲”之下，她被母亲压住的憋闷几乎把自己成为黄色城堡里的一条“名牌

7) 陳 染《殘痕》，《另一只耳朵的敲擊聲》，經濟日報、陝西旅游出版社，1999，p.272.

狗”。总是感到被母亲监视的黛二，她的门扇的每一角封闭得格外严紧，都是为了提防随时而来的母亲的窥探。要不这样做，窥探的眼睛总是不放过她的一举一动。这些承受不了的精神压力已经延续了十几年，这等于说她心理的紧迫也延续了如此漫长。这部作品中的母女战争已经超过了《无处告别》中的“反常状态”，甚至变为一种“歇斯底里”状态。《无处告别》中的黛二对母亲的感情是爱与恨的交叉中悲伤和欢乐的交织，《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黛二对母亲的一切感觉似乎说不上单纯的爱与恨，而是一种恐怖和爱怜以及压抑造成的病态倾向——母亲成为她永恒的负疚情结。

她是我亲爱的，是把我身体里每一根对外界充满欲望的热烈的神经割断的剪刀，是把我浑身上下每一个毛细孔所想发出的叫喊保护和无一丝裂缝的囚衣。母亲，是我永恒负疚情结。多么害怕有一天，我的母亲用死来让我负疚而死。母亲，饶我！

这许多年来，我的母亲始终认为她对我的爱远远超出我对她的爱，总是为此对我不满。于是，我总是梦见她要考验我一下。<sup>8)</sup>

两位母亲都由于女儿身边除了自己还出现了他人而与女儿争吵起来。争吵的表面话题通常不是女儿的朋友，但对这事一直感到不满的母亲总是找个借口吐露不平衡的心情。该作品中的母亲想要独占女儿，心甘情愿做一个出色的侦探。母亲不仅监视隔壁的女儿，更是连窥探女儿在外边时的行迹：“这种不声不响、秘而不宣的侦探与反侦探的活动，在她们身边蔓延，越来越成为一张巨大而无形网，笼罩着她们每分钟的日常生活<sup>9)</sup>”。该作品的母亲不像《无处告别》中的母亲，失去丈夫后留下来一大片空白而更加靠近女儿，文本中塑造的她的形象，某种程度上包含着对异性爱的心理障碍。她不但具备智性和灵性，而且拥有优雅的外貌，“命中注定无人能与她同床共枕”，这十年之内两个男人曾经追过她，但都不足以动摇她的心，她终于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还是留在女儿身边。

女儿同样结婚和离婚的经历，在文本中没有占据主要的分量，只是提示着她现在

8) 同注 7, p.274, p.278.

9) 同注 7, p.310.



的单身女人的身份，是理解她的简单身世的前提。如此，她曾经与异性的交流中有过的爱情、结婚、离婚，都在她的精神世界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与“大树枝”的一段交往同样重复了她对异性爱的这些态度，给“大树枝”留下了“玩弄男人”的虚无。此时此刻，伊墮人的出场带有极不寻常的意味。从黛二和伊墮人的初次相识到彼此了解的整个过程，都包围着一种神秘和朦胧的气氛。黛二的私人秘密记录本—日历簿—被伊墮人阅读，从此伊墮人给黛二引起不少的“波动”，黛二很快被她迷住。冰冷和苍白的伊墮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黛二，对黛二极有把握的语调毫无阻挡：“告诉你，黛二，没有男人肯于要你，因为你的内心与我一样，同他们一样强大有力，他们恐惧我们，避之惟恐不及。若我们不在一起，你将永远孤独，你的心将永无对手……（……）可是，你是一个多么矛盾的统一体啊……”<sup>10</sup>。伊墮人完全读透了黛二的内心，黛二也更倾向于“同性爱”的女人。

就这样，该作品彻底拒绝了父权社会的异性结合关系，而赋予了两个女人“同性爱（姐妹情谊）”的倾向。母亲和女儿除了血缘关系带来的应有的相似以外，她们两还有着“同性恋（姐妹情谊）”倾向的共同之处。她们彼此非常了解对方，而且她们两如此惊人地相似，但相处得并不和谐融洽。对母亲来说，女儿不但是在母亲精神上能够执掌的对象，而且是陪伴这一生的唯一伴侣，母亲对黛二的爱到死也会延续，甚至母亲认为“黛二她活着是我的，死了也是我的”。女儿是母亲生命的灵魂，恐怖的占有欲使母亲无法接受总有一天女儿会从自己身边远离的现实。因此，母亲歇斯底里地打断了黛二与所有外人的关系，因为母亲太爱女儿了。值得注意的是，母亲对黛二的爱已经不是平凡的母爱了，而是一个女人所有精力的全部投入。

黛二不是“寻找母亲花园”<sup>11</sup>的女儿，而是孤独寻找“自己精神家园”的苦行者。她像她的日历簿一样，终于离家出走，到了遥远的西半球城市—伦敦。P城从来不属于她，她认为这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不会属于她的，也无法知道哪一个角落会成为她的“最后停泊地”。她没有永久归属的家园，她是一个没有目的地然而持续行走的旅游

10) 同注 7, p.305.

11) 沈建青《寻找母亲花园的女作家：几位美国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母—女”话题》，《外国文学》，1997，第1期。寻找母亲花园包含着母女之间令人鼓舞的密切关系意义，作者认为这一母亲和女儿是“被时代隔开的合作者”。

者，也许等待着她的只有持久的浪迹天涯。无家可归的迷茫，到底“何处是我家园”的迷茫，更加把她与这世界隔离。她与世界格格不入，她在这世界里只能暂时拥有舒适的休息空间而已。女作家的“无历史归属感”往往夺走她们对这世界应得的安全感。安全感的丧失自然造成了与世界永远不和谐的“漂泊意识”。女性无法扮演父权制提示的种种角色，而且无法与已经扮演着的人结织关系。她想起母亲时“整个欧洲低垂的雨雾都浸满我的双眼”，朦胧、刺痛、湿润、沉闷、低落，这些错综复杂的意象碎片在雨雾中乱飘。黛二连亲母也接受不了，虽然她们俩是同一个性别。

九十年代女性早就拒绝了男性，她们抱着复活般的希望转眼到女性那边的“能够代替男性”的内面。“母女纽带”、“女同性恋”、“姐妹情谊（女性连带）”<sup>12)</sup>等女人与女人的关系模式，蕴含着对父权秩序的反抗、代替、出路、颠覆的意义。法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露丝·伊瑞格瑞对于女同性恋认为：“在父权文化中，女性被当作物，当作男人之间可以交换的商品，无论在语言领域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女性只能是物和客体，而同性恋则是一种颠覆这种文化失序的方式……女同性恋则是拒绝成为男性的商品”<sup>13)</sup>。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近三十年的时间中重新反思的母性话题凸现出“母女纽带”，这一关系在母性和女性内质的互补、相助的意义上受到鼓励。但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母亲和黛二的关系彻底瓦解了，通过陈染的深思，隐藏着的母女关系的负面现实，一种病态的冲突关系就此被打开了，打开得如此惊人、赤裸、淋漓尽致。陈染的这部作品不但再一次凸现了女性立场，而且在解读母性立场的方面，也提供了不可忽略的焦点话题，即，父权制如何破坏大母神的神话原型，而在母性主义旗帜下造成了“制度的母性”。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制度的母性经过父权制的不断修改而形成，与母性的原型有着相当的距离。按照激进女性主义的分析，父权制性别压抑的两大基础是“性（sexuality）”和“母性”。制度的母性，只能按照父权制所规定的母性角色，实践性角色分担逻辑，是一种社会性角色。母性主义是强迫母性角色的父权制的具体机制。在母性研究中，母性本身的“内在因素”和父权制的“外在势力”的不谐和状态，这

12) 〔英〕瑪麗·伊格爾頓編，胡敏、陳彩霞、林樹明譯《女權主義文學理論》，pp.39—43，文藝新學科建設叢書，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作者認為女同性戀除了女性與女性之間的具体“性的體驗”關係以外，還有包括女與女之間的姐妹情誼（sisterhood）關係和母女紐帶。

13) 張岩冰，《女權主義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p.167。

些矛盾状态形成了九十年代中国的女性文学空间背景。

### III. 結語

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开始运用八十年代已传播到大陆来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 对该理论进行“中国式消化”的作品陆续出现, 但是与此同时, 父权制仍然掌握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因此, 女性在反抗父权制的过程中自然对女性之间的相互连结进行巩固, 女性纽带把个体的女性势力结成群体势力, 更有效地攻击父权意识形态。女性纽带来自颠覆父权制的图谋, 于是它本质上否定权力和服从的父权制思想, 追求“平等”、“自由”、“和平”。但是“内在因素”和“外在势力”的冲突妨碍着女性纽带的健全发展。《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母亲, 部分带有“女性同性恋”的倾向, 终于与女儿隔离的原因就在于她和女儿的关系中始终是权力和压抑的加害者。由于父权制的外压, 她的内质已经毁灭了相当一部分, 父权的内质代替了她独有的女性母性内质。这一母女纽带的瓦解, 从深层暴露了父权制机制对母性的破坏, 小说描写了丧失方向感的女性母性的迷茫状态。女主人公黛二选择的逃避, 短时间内内能够回避问题, 但不能成为长久而根本的解决方法。就像母亲仍然独自留在北京一样, 她们的话题仍然留着, 留在继续探索她自己的话题之中。不过她们的话题不能留住, 不久的将来会延续到如何重构母女关系这一话题之上来。

#### 《參考文獻》

- 陳 染,《殘痕》, 經濟日報、陝西旅游出版社, 1999.  
呂晴飛 主編,《中國當代青年女作家傳》, 中國婦女出版社, 1990.  
楊匡漢、孟繁華 主編,《共和國文學50年》,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  
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  
林丹妮,《中國當代女性文學史論》,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5.  
陳順馨,《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

- 鮑曉蘭 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 劉慧英,《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 張岩冰,《女權主義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 李銀河,《同性戀亞文化》,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 李小江,《婦女研究的緣起、發展及現狀—兼談婦女學科建設問題》,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 1998.
- 沈建青,《尋找母親花園的女作家:几位美國少數民族女作家的“母—女”話題》,外國文學,第1期 1997.
- [英] 瑪麗·伊格爾頓 編,胡 敏、陳彩霞、林樹明 譯《女權主義文學理論》,文藝新學科建設叢書,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
- [美] Josephine Donovan 《女權主義理論》(韓文版),文藝出版社,1995.
- [美] Adrienne Rich 《OF WOMAN BORN -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韓文版),平民社,1995.

#### <국문제요>

중국현대문학시기 여성작가의 소설 속에 등장하는 반역적 어머니의 형상은 가부장제가 만들어 낸 전통적 모성주의를 정면으로 비판하는 작용을 하였다고 평가 받고 있다. 보편 의식에서 인식하는 어머니의 이미지와는 달리 뒤틀린 모성 형상에 대한 글쓰기는 여성의식의 성장과 함께 신시기 초기 여성문학을 거쳐, 90년대에 이르러서는 모녀관계의 와해와 재구축이라는 새로운 시도로 진행되기에 이른다. 본 논문은 91년과 94년에 창작된 진염의 소설 두 편을 어머니와 딸의 관계를 중심으로 분석하였다. 작가는 장결의 80년대 작품에서 드러나는 여성연대와 자매애의 구도를 모녀관계에 투사하여 새로운 시선으로 이미 와해되고 있는 모녀관계를 재조명하고 있다.

**關鍵詞** : 모녀 관계, 자매애, 여성, 모성, 여성연대, 사회적 성

이 논문은 2008년 11월 30일에 접수되어 2008년 12월 7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08년 12월 15일 편집회의에서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